

論圖書採訪學

On Library Acquisitions

黃宗忠
Chung-chung Huang

武漢大學圖書情報學院
College of Library Information of Wuhun University

【摘要 Abstract】

圖書採訪工作是圖書館工作的重要一環。它伴隨圖書館產生，已有悠久而漫長的歷史。隨著圖書館學的出現，圖書採訪成為必要內容。然而長期以來，圖書採訪理論發展比較慢，內容比較單薄，豐富的圖書採訪工作實踐並未完全昇華為理論。為此，本文想就建立和發展圖書採訪學談些不成熟的看法：一、建立和發展圖書採訪學的必要性；二、圖書採訪工作的實踐是建立和發展圖書採訪學的基礎與源泉；三、圖書採訪理論的發展、現狀與評價；四、圖書採訪學的研究對象、內容、體系結構；五、圖書採訪學的相關學科及研究方法；六、加強和發展圖書採訪學的管見。

The acquisition of books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library operations. It has been brought about with the initiation of the libraries and thus has had its existence and history for a very long period of time with the availability of more libraries book acquisitions have become very essential. However, owing to the slow development of the acquisition theories and the simplicity of the operations the abundant experience of the practical acquisitions have not yet been shaped as profound theories.

Therefore, the essay aims to make the following suggestions about the formation of the development of library acquisition theories:

- 1.the necessity of the forma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library acquisitions theories.
- 2.the implementation of library acquisitions as the foundation and sources of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acquisitions theories.
- 3.the development, state-of-art and evaluation of acquisitions theories.
- 4.the research scope, contents and system structure of library acquisitions theories.
- 5.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ibrary acquisitions and other relevant fields of study and the research methods.
- 6.opinions on the emphasis and development of library acquisitions theories.

關鍵詞 Keyword

圖書採訪學 採訪理論

Library Acquisitions, Acquisition theories

自圖書館在人類社會出現以來，圖書採訪已成為圖書館工作必不可少的一環。隨著圖書館圖書採訪工作實踐的發展，圖書採訪的內涵不斷豐富與完善。目前儘管世界圖書館界對圖書採訪這一名詞或術語缺乏規範，叫法不統一，譬如有圖書採訪、圖書購求法、圖書選擇法、文獻收集、藏書補充等詞，但人們對於圖書館這一工作環節或這一現象的內含與範圍是明確的、清楚的。

隨著圖書館圖書採訪工作實踐的發展，圖書採訪的經驗、方法也由少到多，圖書採訪的理論也隨之產生，並已形成一個初步的體系。這既是圖書採訪工作實踐發展的必然，也是圖書館學產生之後整體發展的需要。然而，事物的發展總是不平衡的，圖書採訪理論與圖書館圖書採訪工作實踐比較，圖書採訪理論相對來說就顯得基礎不厚、脆弱；與圖書館學整體比較，圖書採訪理論的內容單薄、瘦小。20世紀以來，雖然一些國家和地區的圖書館學者就圖書採訪理論進行了一定研究，出版了一些專著，但數量很少，影響有限。至今，仍有不少國家和地區把圖書採訪理論附屬於藏書建設、圖書館藏書、圖書管理、知識組織等體系，沒有形成獨立的體系，這極大地限制和阻礙了圖書採訪理論的發展。為了改變這種局面，使21世紀的圖書館學理論整體獲得平衡發展，我們特就圖書採訪學的有關問題進行一些探討。

壹、建立和發展圖書採訪學的必要性

建立和發展圖書採訪學，今天仍有一個重要問題，就是如何在圖書館界更大範圍內取得共識。20世紀以來，雖然不少人已認識到圖書採訪工作在圖書館的重要地位，然而對是否應建立圖書採訪學仍表懷疑，認為圖書採訪工作簡單、具體，缺乏理論性。特別人類跨入資訊時代以來，

資訊熱”強烈地衝擊著傳統圖書館，衝擊著圖書館界人們的頭腦，一些著迷於“資訊熱”的人，更對傳統圖書館學不感興趣，認為圖書採訪學更沒有必要研究了。果真如此嗎？不！我們認為圖書採訪工作不僅過去、現在重要，將來更重要，作為指導圖書採訪工作的圖書採訪理論——圖書採訪學也將更為重要，充滿希望。

一、圖書採訪工作永遠是圖書館的基礎工作

人類社會只要有圖書館存在，就不管在什麼時候，什麼地方，什麼圖書館，圖書採訪工作始終是它的基本工作，永遠不會改變的。早在18世紀初期，德國著名數學家、哲學家、傑出的圖書館管理者萊布尼茨（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公元1646-1716年）就說過：圖書館館藏的補充，如同養料對有生機體一樣，是必須的。前蘇聯教育、圖書館事業的先驅者克魯普斯卡婭（Надежда Константиновна Крупская，1869-1939年）以為：“圖書館中最重要的就是選擇圖書”，因為“既然圖書館能帶來巨大的好處，那麼它就也能帶來很大的害處”。

圖書採訪不僅直接影響圖書館藏書的數量與質量，讀者人數、讀者需求的滿足程度，圖書館的工作流程、社會效益，還是評價圖書館價值、管理者成效的重要標誌之一。美國圖書館學家唐斯（Robert B. Downs）認為，一個圖書館的工作，“後人對我們工作如有所褒貶，絕不是因為完備的目錄，精密的分類方法，簡便的出納制度，或是完善的參考服務，而是針對藏書——究竟從我們手中留下些什麼？或是忽略掉什麼？”我想這些話今天對我們仍是有用的，沒有過時的。

進入資訊化社會以後，隨著資訊技術的發展，社會資訊化程度越來越高，資訊量越來越大，傳遞資訊的渠道和存儲資訊的媒體越來越多，特

別是資訊高速公路、互聯網路、連線體系、資料庫、多媒體、光碟等的出現，圖書館的圖書採訪工作是否就要消失或被取代或作用降低呢？我們認為在資訊社會，圖書館圖書採訪工作只會強化，不會削弱。這是因為：①在資訊社會圖書館自身就是資訊系統的組成之一，資訊高速公路、網際網路是資訊通道，圖書館是資訊源。資訊源就要不斷提供新的資訊，這就要加強圖書採訪工作；②在資訊社會，新的資訊系統、新的資訊產業將不斷湧現，但大多將是屬於營利性的，它們不可能替代以公益性為主體，以收集、保藏人類文化遺產，免費為社會提供文獻資訊服務的圖書館的功能，因此圖書採訪功能仍將得到充分發揮；③在資訊社會，不僅資訊量不斷增長，資訊的媒體材料也不斷增加，如何根據圖書館的有限條件和目標，收集、選擇不同內容、不同類型的資訊媒體，仍将是圖書採訪的基本任務。

近些年來，圖書館界一些人以資訊管理或資訊資源管理代替圖書館學，以資訊收集取代圖書採訪。從大的範疇來說，這是沒有錯的，圖書館是資訊的小範圍，資訊包含了圖書館，正像人包含了男人、女人，老人、中年人、兒童、白種人、黃種人、黑種人一樣。然而這種大範圍取代小範圍，大概念取代小概念，實質上是取消了小範圍，使大概念的內涵更模糊，研究對象不明確，因為資訊是個大概念，不僅包括圖書館，還包括新聞、廣播電視、電報電話、氣象、無線電、衛星……等等。這種以大概念取代小概念，對學術研究來說是一種倒退，就像現代的自然科學都要回到古代的自然哲學中去一樣。這種取代，將使圖書館學的發展受到嚴重影響，研究人才斷層，代價是高昂的。

二、圖書採訪工作需要圖書採訪理論作指導

要建立一個有價值的館藏，或者是基本上能滿足讀者需求的館藏，它不僅需要圖書館圖書採訪人員及相關人員的努力，還要有正確的科學的圖書採訪理論作指導。理論來源於實踐，又回到實踐指導實踐。沒有理論作指導的實踐，是盲目的實踐，或是經驗主義的實踐，那是不可能搞好圖書館館藏建設的，更不可能建立一個科學的、優質的、有價值的而又適應讀者需要的館藏。

有些人說，圖書採訪工作主要是一些技術方法，很簡單，沒有什麼理論，無非是勾勾畫畫，跑跑書店，打打電話，徵求徵求意見。這種看法是很不公正的，只看表面，不看內容，只看現象，不看實質，或者是對圖書採訪工作不甚瞭解。圖書採訪工作是一項學術性很強的工作，既有理論，又有技術方法。有人把它分為作業設計與作業執行兩部分，也有人把它分為指導性活動與執行性活動兩部分，還有人把它分為選擇和採集兩部分，認為前者理論性、學術性很強，後者實踐性、技術性很強。不管怎樣說，圖書採訪工作做為一個整體，是理論與技術方法兼有，思想與行動結合，既要總體設計，又要具體執行。首先要制訂方針、政策，確立目標，明確範圍和原則，然後根據條件，選擇需要的圖書，在具體執行中，還要協調控制，最後還要評價。搞好圖書採訪工作，不僅要有圖書館學知識還要有廣博的科學文化知識與外語，要有管理科學、公共關係學、經濟學，控制論等知識。

三、圖書採訪工作的實踐經驗需要總結提昇為理論

圖書採訪工作的實踐是圖書採訪理論的源泉，一切圖書採訪理論都是人們直接或間接地從圖書採訪實踐中提出或總結、提昇而來。長時間以來，廣大的圖書館工作者在圖書採訪實踐中積累了許多經驗，通過一代一代人的開發、總結、概

括、提昇，形成了我們今天的既有理論與體系。對這些理論的總結、形成做出貢獻的主要有中國宋代鄭樵、明代祁承爍、20世紀30年代的杜定友、呂紹虞、邢雲林，俄國的奧列寧、雷斯，英國的帕尼茲、麥考文，美國的杜威、普爾·克特，印度的阮甘納桑等。他們各自在前人的基礎上，對不同國家或地區在不同時期的圖書採訪實踐進行了發掘、總結、概括與提升，提出了各自的看法，儘管還不十分完善、系統，但是十分有益的。

隨著社會的發展，科技的進步，圖書館的變革，圖書採訪工作實踐的內容越來越豐富，經驗越積越多。然而，由於各個時期的社會環境與條件不同，過去總結出來的經驗與理論，有些具有普遍意義，有些有很大的局限性，有些過去適用而今天不適用。這就要求我們從實際出發，既要批判地繼承過去的經驗與理論，又要認真總結今天的新經驗，上升為理論，把二者有機結合起來，用以指導再實踐。

貳、圖書採訪理論的形成與發展及其評價

圖書採訪理論的形成與發展，是一個由低到高，由簡單到複雜的過程。它經歷了圖書採訪知識的積累，圖書採訪方法的逐步形成，圖書採訪理論的系統化等階段。

一、圖書採訪知識的積累

人類有了圖書館，就有圖書採訪活動。據中國史冊記載：漢武帝（公元前156-前87年）曾命丞相公孫弘廣開獻書之路，後百年之間書積如山，這是中國圖書採訪活動的先河；漢成帝（公元前51-前7年）曾派陳農求遺書於天下；唐太宗貞觀年間，魏徵（公元580-643年）等人曾建議太宗請購天下之書，並由宮廷中的專人司掌。15世

紀，意大利烏爾比諾城公爵費德里戈·達·蒙特菲爾特羅（FEDERIGOODA MONTEFELTRO，公元1422-1482年）的圖書館，就長期雇用了30-40名抄員抄書，這一度雇用佛羅倫薩有名的書商比斯提特負責圖書採購。

隨著圖書採訪活動的開展，必然要在圖書採訪實踐中積累一些採訪的知識。這些圖書採訪知識又如何轉化為圖書採訪理論，這是一個漫長的過程，而且世界各個國家和地區發展不平衡，中國早於西方。為什麼早期圖書採訪實踐積累的採訪知識轉化為理論慢呢？主要原因：①早期的圖書館數量少，大多處於封閉狀態，相互往來少；②印刷術沒有發明前，圖書數量少，主要是寫本書，複本大多是抄寫的，因此採購活動少；③圖書館工作人員少，採訪人員大多是兼職的，專職的少，對圖書採訪的經驗研究的少；④圖書館的發展對圖書採訪理論需要不迫切。

二、圖書採訪方法的逐步形成

由於圖書採訪知識累積的不斷增多，圖書館發展的需求，公元12世紀開始出現圖書採訪知識向理論轉化，但在很長一段時間裡，主要集中於圖書採集技術方法的總結與昇華。在中國，宋代著名目錄學家鄭樵（公元1103-1162年），在《通志·校讎略》一書中曾提出“求書八法”；即類以求，旁類以求，因地以求，因家以求，因人以求，因代以求，求之公，求之私。歸納起來，就按圖書學科的門類、著者、年代、出書單位、收藏單位等，分別系統採訪收集，積30多年的藏書經驗，撰寫了《澹生堂藏書約》一書，系統總結了讀書、聚書、購書、鑑書的經驗，在鄭樵“求書八法”的基礎上，提出了3種購書方法：輯佚法、分析法、編製採訪目錄法。

16世紀的歐洲，在總結既有圖書採訪方法的基礎上，並試圖探索建立一些新的圖書採訪方法

，或叫藏書補充方法。1534年，法國弗朗斯瓦一世（Francois I，公元1494-1547年）在巴黎南部的楓丹白露建立了一所義大利式的皇家圖書館。1537年12月，弗朗斯瓦一世為了保證皇家圖書館藏書有永久性的補充來源，頒佈了《蒙特利埃法令》，法令規定出版商必須向皇家圖書館呈繳其出版物每種一本，在國外出版並在國內出售的圖書也要告知該館，以便購入。這就為一些圖書館的藏書補充提供了一種新的方式。

三、圖書採訪理論的系統化

進入17世紀，除圖書採訪技術方法繼續得到發展外，圖書採訪理論研究有了新的突破與進展，開始向圖書採訪理論系統化邁進。特別要指出的是從17世紀至19世紀下半葉，西方圖書採訪理論的研究比中國活躍得多，圖書採訪知識積累、技術方法逐步形成時期的中國優勢已不存在。中國到20世紀才出現一些比較系統的論著。

1627年，法國紅衣主教、講長麥士姆的私人圖書館館長加布里埃爾·諾德（Gabriel Naude，公元1600-1653年）出版了《關於創建圖書館的建議》一書。全書13章，就有3章討論書的數量、書的選擇、書的採訪問題，他在書中說：“據我所知，尚無一人告訴人們如何為一所莊嚴華麗的圖書館選書，採購書”。並在書中闡明了為何要搜集圖書，還列舉了應該搜集和不應該收藏的書。這是歐洲最早的圖書館學概論，也是第一次比較系統的闡述圖書採訪的理論問題。

19至20世紀，圖書採訪理論研究更上一層樓，觀點林立，研究者甚多，重點是圖書採訪的目標、方針、政策、範圍，選書原則，協作協調與控制等。下面選擇一些有代表性的觀點進行論述：

(1)圖書館藏書絕對完整性，或稱絕對完備論：主要是對國家圖書館而言。1808年，俄

國的奧列寧，A. H.開始研究國家圖書館藏書絕對完整性的概念。他把帝國公共圖書館視為一切涉及俄國歷史的文獻庫。絕對完整論思想的積極擁護者是英國不列顛博物館圖書館第六任館長安東尼·帕尼茲（Antonio Genesio Mania Panini，公元1797-1879年）。他認為不列顛博物館圖書館應當收藏世界上一切語種的有用的珍貴圖書。英文的藏書應當是世界第一的，俄文藏書應當在俄國境外第一的，其它外文收藏也應當如此。過去被忽視的地圖、樂譜、報紙以及官方文件也在收集之列。

藏書絕對完整性，經過近200年的實踐與研究，不少人持否定意見，認為其缺點在於：一是從歷史發展看，出版物增長很快，而圖書館經費、人力、空間都是有限的，實際上這一想法是難以實現的；二是圖書館收藏大量沒有科學和實用價值的多餘出版物，實際上是淹沒了有用的藏書，佔用了空間。因而，前蘇聯有些人主張“藏書最佳完整性”，即為某個研究課題或問題，詳盡地收集出版物。

(2)圖書選擇論：針對藏書絕對完整性，19世紀俄國的斯達索夫提出了藏書補充選擇論，認為國家圖書館藏書補充需經嚴格的選擇。斯達索夫的功績在於提出了圖書“選擇”一詞，並對藏書的系統化和特色化的研究做出了貢獻。20世紀初期的俄國和後來的蘇聯一些圖書館學研究者對圖書選擇理論作了較深入的研究。魯巴金（Николай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Рубакин，公元1862-1946年）1911年以出版了《選書理論》等著作。對魯巴金的許多觀點長期表示贊同的哈芙金娜（Любовь

Борисовна Хавкина, 公元 1871-1949年), 從1904年至1930年, 出版了《圖書館及其組織與技術》、《中、小型圖書館手冊》等書, 在魯巴金和哈莫金娜的著作中都主張客觀地、宏觀地選擇圖書。而吉隆諾夫, K. H. 等人主張選擇思想性、學術性、藝術性方面優秀的圖書。

圖書採訪中的選擇理論, 從提出至今, 已有100多年, 為當代圖書館界普遍接受, 並成為今日主流。特別近幾十年來, 由於圖書館購書經費有限, 出版物的品種與數量不斷增長, 出版物良莠混雜, 圖書館規模與任務不一, 因此圖書採訪中對圖書進行選擇是必經之路。不少學者已把圖書選擇、圖書採訪、藏書補充、圖書採購看成是同一內容、同一事物。由王振鵠教授編著, 台灣學生書局1984年出版的《圖書選擇法》一書, 就反映了這種走向。

(3)圖書館需要論: 圖書選擇論確立後, 那麼選擇什麼呢? 首先是選擇圖書館需要收藏與讀者需要使用的圖書。1826年, 俄國莫斯科大學圖書館館長雷斯提出了圖書館需要理論。他認為, 首先需要選擇在科學上最新、最有價值的圖書; 其次是補充圖書館藏書中缺藏的早期專門出版物。雷斯還提出了一些超越自己時代的想法, 如藏書補充的協調、利用書目參考資料選書、組織館際互借等。19世紀, 美國普爾·克特提出了讀者需要論。他主張選擇圖書應當以適合讀者需要為宗旨, 挑選適當的圖書, 而不是所謂最好的圖書。重視讀者的需要, 不強調出版物本身的價值。他認為, 讀者的興趣、水平、修養、年齡不同, 讀書需求各異。因此, 應根據讀者的具體情況, 選擇適合讀者需要的圖書。

圖書館需要論, 自19世紀末以來, 逐漸在圖書採訪工作中佔上風, 已成為今天圖書選擇最重要的指導思想, 選擇任何一本書, 必須考慮圖書館藏書需要和讀者使用需要這兩個因素。

(4)圖書價值論: 圖書採訪應選擇有價值的圖書。這種價值, 主要指圖書的內容價值, 即圖書的科學性、學術性、藝術性。從圖書館的角度講, 其圖書內容有收藏價值、使用價值。1667年至1716年, 一直在德國圖書館工作的大數學家萊布尼茨曾提出: 有學術價值的新出書刊, 應及時地、連續地、均衡地補充採購。1876年, 在美國費城召開的美國圖書館協會成立大會上, 麥維爾·杜威 (Melvil Dewey, 公元 1851-1931年) 提出: 以“最好的圖書, 最多的讀者, 最少的開支”做為圖書選擇的準則。以1917年至1939年, 一直主持前蘇聯圖書館工作的克魯普斯卡婭提出: 用來補充圖書館藏書的只能是那些提供“最大的知識量, 而所耗最小”的出版物。今天, 圖書選擇仍必須考慮每本書的價值。

(5)圖書選擇評分: 英國公共圖書館學家麥考文 (Lionel Roy Mccolvin, 公元 1896-1876年), 1925年僅29歲時發表了《公共圖書館圖書選擇原理》一文, 認為圖書選擇是圖書館中最基本的任務, 或者稱為基本功能。優良的圖書選擇會導引出優良的讀者服務。因此, 選擇圖書時, 既要重視圖書的知識價值, 又要重視圖書的社會需求, 他主張把兩者結合起來, 並提出了一個純理論的“圖書選擇評分法”。他舉了兩個例子加以論證:

例證一: 假設一書A的知識價值為10, 另一書的知識價值為1, 而這兩種書的

社會需求性均為 6，則 A、B 兩書的選擇評分之比為 60：6，A 書的評分最高，亦即選擇 A 書。

例證二：假設例一中所述的 A、B 兩種書，A 的知識價值為 10，B 的知識價值為 1，A 的社會需求性為 6，B 的社會需求性價值為 72，則 A、B 兩書的選擇評分之比為 60：72，B 書的評分最高，亦即選擇 B 書。

麥考文的圖書選擇評分法，幾十年來受到圖書館界重視，並成為現代選擇圖書的重要理論。但也有不少學者持有異議，認為麥考文的論證在實踐上很難實行，對各種圖書的兩種評分不可能精確計算，而且也不是高分排斥低分，只選其一，不選其二，而是要全面兼顧，分別選擇之。

我們認為麥考文的圖書選擇評分法雖有其不足，但具有較高的科學性。他把定性方法與定量方法結合起來，比單一的定性方法好。評分法雖然對圖書的知識價值和社會需求性不是精確計算，只是一種估算或推算，但這比隨意圈定或單憑個人主觀決定好。我們認為，運用評分法，對圖書知識價值和社會需求性兩個方面進行綜合評分，其結果必然是四，其正確選擇應是：第一，知識價值高，社會需求性高，即選擇之；第二，知識價值低，社會需求性低，即不選擇之或少選擇之；第三知識價值高，社會需求性低，慎選之；第四，知識價值低，社會需求性高，慎選之。

(6) 社會調查選擇論：英國的維納德 (Wellard, J. H.) 認為圖書選擇的社會需求性應通過社會環境調查和讀者需求調查來確定，這是對社會需求理論的補充與深化。他為環境調查確定五大項目：

圖書館區域人口密度與讀者分佈、城市發展，工業發展，社會發展；為讀者需求調查確定了五大項目：讀者類型，讀者數量，閱讀興趣，閱讀內容及其原因等。維納德提出的圖書選擇兩項調查，今天仍是有現實意義的，特別是對公共圖書館，可惜做得太少了。

(7) 讀者使用概率論：印度著名圖書館學家阮甘納桑 (Shiyali Ramamrita Ranganathan, 公元 1892-1972 年) 1966 年出版了《圖書館書刊選擇》一書，書中提出：“負責圖書採購的圖書館員或教師，應該注意到選購圖書對於讀者使用該書的概率。”即選擇符合讀者需要的、使用率較高的圖書。阮甘納桑的讀者用概率論，是對圖書選擇社會需求理論的補充和發展。

(8) 圖書採訪協調論，或圖書合作採訪論：20 世紀以來，隨著知識的爆炸，出版物的猛增，圖書館經費、人力、物力、空間的有限，一個圖書館要做好圖書採訪工作，選擇和收集本館需要的圖書已成困難，力所不及。在此情勢下，圖書採訪工作的出路，就是要突破或拋棄一館獨立採訪，廣而全的做法，要打破館與館的界限，走多館合作採訪，甚至全國合作採訪，區域合作採訪之路。這是採訪工作的新思路、新理論，也是圖書採訪工作必經之路。到 21 世紀，圖書合作採訪的路，還要大步地走下去。

圖書採訪合作起源於 20 世紀初期，但有系統的設想並見之於實踐是 40 年代。1942 年 10 月 9 日，美國國會圖書館行政委員會在康涅狄格州法明頓市開會，研究有關採訪合作問題，會中 Julian P. Boyd 提出：美國圖書館界應分工積極蒐集各國具

有價值之資料，以供研究之需，務使美國以外國家的重要出版物，至少有一份收藏在美國的圖書館中，此一出版品將列入國家聯合目錄，以便於館際互借和影印複製。這一提議獲得通過，並就會議結論制訂了計劃，定名為“法明頓計劃”。這是一個自願自發的協定，有64所圖書館參加。1948年開始實施，到1972年已取得較滿意的效果，收集了100多個國家的資料。

在法明頓計劃的影響下，1954年，丹麥、芬蘭、瑞典、挪威等四個斯堪的納維亞國家的圖書館制訂了“斯堪的亞計劃”，採取了超國家圖書採訪合作的方針。這也是國際區域合作採訪的開始。1978年7月到1979年8月，馬來西亞、菲律賓、新加坡、泰國、印度尼西亞經各自政府批准，成立了東南亞國家圖書館和文獻中心聯合體（NLDC-SEA），開展了區域性的國際圖書採訪合作。

(9) 圖書採訪國家控制論：1982年，由朱迪思·科林斯（Judith Collins）和魯斯·芬納（Ruth Finer）合著的《國家採訪方針與採訪系統——現行系統與可能模式的對比研究》出版。這是國際圖聯（IFLA）“世界出版物收集與利用”（UAP）計劃的組成部分。書中提出：國家採訪方針產生集中和控制該國圖書資源的方案，以提高資源的可獲得率。國家採訪方針不是一個國家級圖書館的採訪方針。它由一個國家級的實體機構頒發，這一機構可以是一個中央權力機關，也可以是一個類似於依據多個執行機構之間的協議書形成的委員會這樣的組織。國家採訪系統是一整套有計劃的確定的程序和做法，其中既包括執行採訪方針的實體機構，也包括在沒

有方針的情況下獲得圖書資料的程序和做法。

四、20世紀以來，中國圖書採訪理論的發展

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西方圖書館學引進中國，圖書採訪理論也相繼而來，經過消化、實踐、總結，20年代就開始出現了中國學者專門研究圖書採訪理論的論著。比較有代表性的有1926年杜定友的圖書選擇法，1927年顧頡剛的購求中國圖書計劃，1931年林斯德的兒童讀物選擇法，1934年呂紹虞的圖書之選擇與訂購，1936年邢雲林撰寫的《圖書館圖書購求法》，這是我國圖書採訪工作的第一次系統性的總結，也是我圖書採訪學的第一部專著。

50年代開始，前蘇聯的圖書館學理論引入中國大陸。在前蘇聯圖書館學體系中，圖書採訪理論是做為圖書館藏書理論的組成部分，特別是一些主要教材和專著。如格里科爾耶夫編著的，1973年出版的《圖書館藏書建設的理論基礎》。作者認為：藏書補充是圖書藏書建設這一更廣泛的過程的一部分。1979年出版的，由斯多利亞洛夫、阿列菲也娃編著的《圖書館藏書》，也是把圖書採訪理論做為圖書館藏書理論的組成部分。在前蘇聯圖書館學理論體系的影響下，50年代至80年代，中國大陸圖書採訪理論研究，除論文外，沒有獨立的圖書採訪理論專著，基本都附屬於圖書館藏書理論。如沈繼武編著的《藏書建設與讀者工作》、李平杰編著的《圖書館藏書》等。把圖書採訪理論歸屬於圖書館藏書理論，從邏輯上來說是不錯的，但極大地限制和削弱了圖書採訪理論的深化和發展，也有損於圖書館學體系的擴展與內容的深化和豐富。

70年代以來，台灣學生書局先後出版了王振鵠編著的《圖書選擇法》、顧敏著的《圖書館採

訪學》。兩書都自成體系，各自從不同的角度探討了圖書採訪工作和圖書採訪學的一些重大問題，內容豐富，具有一定的理論性、實用性、開拓性，為圖書採訪理論的發展作出了有益的貢獻。

參、圖書採訪學的研究對象、內容與任務

上面我們對圖書採訪理論的形成與發展過程進行了簡要的闡述，從中可以看出：過去的圖書採訪理論研究主要偏重於圖書採訪工作，而對圖書採訪學自身的理論問題探討甚少。為了推動圖書採訪學的發展，下面想就圖書採訪的含義、圖書採訪學的研究對象、研究內容與任務等基本問題談些看法：

一、圖書採訪的含義

在討論圖書採訪學的研究對象之前，我們必須先明確什麼是圖書採訪或圖書採訪工作。我們認為，圖書採訪是根據圖書館的性質、任務和讀者需求，通過覓求、選擇、採集等方式建立館藏，並連續不斷地補充新出版物的過程。它是一種系統過程，或叫圖書採訪系統更為恰當。

關於圖書採訪，目前有多種叫法，如圖書館採訪、圖書選擇、文獻收集、藏書補充、圖書購求等。由於名詞術語不統一，因此對圖書採訪的解釋也不完全一致，含義不完全一樣。為了統一概念，便於分析，現將70年代以來一些有代表性的解釋選擇幾種如下：

顧敏著的《圖書館採訪學》認為：“圖書館採訪的詮釋可分為兩方面，狹義的採訪是指為建立圖書館館藏，而進行之「收而有之」之工作；廣義的採訪是指有關圖書館方面為建立館藏所作之覓求、揀選與收取等工作”，“採訪工作大體上可分為作業設計與作業執行兩部分”。王振鵠編著的《圖書選擇法》認為：“圖書館選擇圖書

有兩種情形，一是為建置圖書館的館藏選擇圖書；……也可以說是狹義的圖書選擇，其工作包括：(1)為新創設的圖書館，或新發展的分館普遍選擇各類圖書，避免館藏偏重於某一方面或某些類別。(2)為已奠定基礎之館藏輸送新血液，使現有圖書得以保持時效，並維持一定的質量標準”。

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出版的《中國大百科全書》（圖書館學情報學檔案學）認為：文獻收集是“圖書館及其他文獻情報機構根據各自目標和讀者需要，選擇文獻並通過購買等多種方式獲取文獻，以累積和補充館藏的工作”。

前蘇聯斯多利亞洛夫·阿列菲也娃所著的《圖書館藏書》認為：“圖書館藏書的補充是指以符合圖書館任務讀者需求的出版物來建立藏書並不斷地予以更新，也就是用最優秀的圖書充實它，並剔除喪失價值的出版物。”

沈繼武編著的《藏書建設與讀者工作》認為：“藏書補充，顧名思義，主要指藏書的增加與充實，它包含兩層意思：選擇出版和採集出版物。選擇出版物即選書工作，指遵循一定的方針、原則，挑選適合需要的出版物；採集出版物即採購工作或購書工作，指採用一定方式和途徑收集出版物。”

以上幾種說法，雖然名詞不一致，內涵有所差別，但所指的事物或現象是一致的，即為圖書館館藏選擇和收集圖書。

名詞術語的不統一，解釋的不大一致，必然有礙於圖書採訪學的發展為了促進圖書採訪學的發展，逐步統一一些基本的名詞術語，看來是必的。怎樣統一呢？除了廣泛地開展討論外，對名詞的內涵取得一致認識也是必不可少的。

圖書採訪或圖書採訪工作，我們認為應該包含以下四個要素或環節：為誰採訪，何處採訪，採訪什麼，怎樣採訪。“為誰採訪”，就是圖書採訪的目標、依據，也就是圖書館的性質、任

務、讀者需求。建立館藏，滿足讀者需求，是圖書採訪工作的最高準則、出發點、歸依。要達到圖書採訪目標，滿狀讀者需求，就要調查研究，進行總體設計，確定採訪範圍，制訂採訪方針、原則、規劃等；“何處採訪”，就是獲取採訪資訊，包括出版資訊、書市資訊、新型資訊媒體的有關資訊等；“採訪什麼”，就是根據圖書館的性質、任務、特點、讀者需求、原則、經費情況、已有館藏選擇需要的圖書；“怎樣採訪”，就是採訪的技術方法。

通過以上分析，我們認為採用“圖書採訪”或“圖書館採訪”一詞較好，比較明確，能反映圖書採訪全過程。“藏書補充”一詞不夠全面準確，不能反映圖書採訪全過程，不能反映建立一個館藏，而只說明在現有藏書的基礎上補充，因而有些人理解為“藏書的增加與充實”，是“選擇出版物和採集出版物”。“圖書選擇”一詞，一般認為是圖書採訪中一個部分，一個環節，一個因素，不是全部採訪工作。

二、圖書採訪學的研究對象，定義與內容

(1)圖書採訪學的研究對象：任何一門學科都有自己的研究對象，有的是獨立的，有的是交叉的，有的是母體的部分。圖書採訪學的研究對象是圖書館學的研究對象——圖書館母體的一部分，即圖書採訪系統或圖書採訪工作。這是因為：第一，研究對象是指人們行動或思考時做為目標的人或事物，圖書採訪系統是客觀存在的事物，是人們研究和認識的客體；第二，理論來源於實踐，指導實踐。圖書採訪學來源於圖書採訪工作實踐，並回到實踐，指導圖書採訪工作。因此理論要符合客觀實際，就必須研究圖書採訪系統；第三，毛澤東

曾說過：“科學研究的區分，就是根據科學對象所具有的特殊的矛盾性。因此，對於某一現象的領域所持有的某一種矛盾的研究，就成某一門科學的對象。”圖書採訪領域的特有矛盾，就是讀者嚮求與覓求、選擇、採集圖書之間的矛盾，研究和解決這一矛盾，就可推動館藏的發展，滿足社會的需求。

(2)圖書採訪學定義：什麼是圖書採訪學呢？

我們認為，圖書採訪學的研究對象是圖書採訪系統或圖書採訪工作，因此圖書採訪學就是研究圖書館讀者需求與覓求、選擇、採集圖書的矛盾產生、發展規律的科學。

(3)圖書採訪學的研究內容：從總體來說：我們認為可分為五大塊：一是圖書採訪的基本理論研究；二是圖書採訪及圖書採訪理論發展歷史的研究；三是選書理論及其方法的研究；四是圖書採訪技術方法的研究；五是圖書採訪現代化的研究。

具體來說，包括以下內容：圖書採訪基本理論；圖書採訪的發展歷史；圖書採訪的組織與原則；圖書採訪資訊；各類圖書館圖書採訪的特點與任務；圖書採訪的範圍；圖書選擇的依據、原則、方法；圖書採訪的方法與程序；圖書徵集、呈繳、調撥、贈送與交換；圖書採訪協作協調與資源共享；圖書採訪工作現代化；經濟學、數學、公共關係學、思維科學、管理科學在圖書採訪中的應用；圖書採訪人員的素質與職業道德；圖書採訪工作的評估；21世紀的圖書採訪工作。

三、圖書採訪學的研究任務

主要有以下方面：一是不斷總結圖書採訪實踐的經驗，並提昇為理論；二是探討圖書採訪的原理與規律；三是研究圖書採訪工作中存在的問

題；四是發展圖書採訪技術；五是預測圖書採訪未來的發展趨勢。

肆、21世紀圖書採訪學研究的環境與課題

20世紀形成的圖書採訪系統和圖書採訪理論將進入21世紀，成為21世紀圖書採訪系統和圖書採訪學發展的基礎、出發點，並與21世紀社會有機的融合，獲得新的發展。

21世紀的圖書採訪學發展方向是什麼？有些什麼新的課題值得研究呢？當然，我們要談100是難的，但是預測20-30年是可以的，有些事物已看到端倪，有些問題明顯存在。

我們要回答21世紀圖書採訪學的發展方向，或提出21世紀圖書採訪學的研究課題，只有到圖書採訪工作實踐中去找，因為理論來自實踐。然而圖書採訪工作是社會的組成部分，受大環境的影響與制約。因此，我們要提出21世紀圖書採訪學的發展方向或研究課題，首先要從21世紀圖書採訪工作所處環境分析入手。

一、21世紀圖書採訪工作所處的環境

21世紀是一個資訊時代，對圖書採訪工作來說，有喜有憂，從客觀環境來說是喜，從主觀條件來說是憂喜都有。

21世紀的社會環境將給圖書採訪工作發展提供機遇、條件，主要表現在以下方面：(1)資訊量大，增長快。1996年美國《未來學家》雙月刊11-12月一期文章稱：21世紀資訊的增長將比人口增長快20倍，並認為自從古希臘時代以來，據估計全世界積累的知識已增長了大約一千萬倍，而在21世紀之內，很可能會再增加一千萬倍；(2)存貯和傳遞知識資訊媒體的新品種不斷湧現。這些新產品體積小，存貯密度大，重量輕，攜帶方便，保存時間長，而且集文學、圖像、聲音於一體

，比印刷品、縮微品等單媒體優越，價格也不很貴；(3)快速傳遞知識資訊的渠道增多，如資訊高速公路，互聯網絡等；(4)新的資訊技術不斷發明、推廣、應用；(5)社會需求量增大。據美國《未來學家》雙月刊1996年11-12月一期文章稱：20世紀末期，全世界仍有20億人受的教育很少，而且21世紀的前30年裡要受教育的人，估計要比整個人類歷史上受過教育的人還多；再就是知識更新奇更快，在21世紀的許多學科領域裡，高級學位所掌握的知識往往在5-10年的時間裡便過時了。這些預測都說明，21世紀讀者對圖書館藏書需求將更大。

從主觀來說，21世紀的圖書採訪工作是喜憂兼有，然而憂將給圖書採訪工作造成困難，制約其發展。其憂，我們分析有以下方面：(1)經費不足。20世紀80年代以來，經費不足似乎成為全球圖書館一個帶普遍性的問題，嚴重影響圖書採訪的數量與質量。這個問題仍將帶入21世紀，儘管經費每年會有所增長，但其增長速度趕不上書價上漲速度；(2)空間有限；(3)採訪人員的整體素質不高，不能適應新的發展；(4)觀念落後，觀點片面。有的人輕視圖書採訪，認為圖書館不買書、不進書照樣存在、開放、運轉；有的圖書館採訪追求一館的全面、系統，不願合作協調，搞“一館主義”；(5)管理跟不上發展，缺乏宏觀組織與規劃，缺乏國家或系統控制，缺乏對採訪工作的監督、評估。

這些就是21世紀圖書採訪工作與圖書採訪學所面臨的環境。

二、21世紀圖書採訪學的研究方向與主要課題

21世紀圖書採訪學的研究方向是建立一個滿足或適應21世紀讀者需求的館藏。它既要為人類保存文化遺產收集和積累新出版的，又要為這個

社會特有的、免費的、公益性的資訊通道不斷提供讀者需要的各種類型的新出版物。

根據圖書採訪工作21世紀所處的環境和研究方向，我們認為有以下方面可做為重點課題研究：

- (1)更新圖書採訪觀念：觀念是指導人們行動的，舊的觀念維護和遵循舊的作法，新的觀念宣傳和推動新的作法。因此，更新觀念是21世紀圖書採訪學研究的重要課題。
- (2)圖書選擇理論與方法的研究：圖書選擇是建立高質量館藏，滿足讀者需求，用好圖書館經費的關鍵。特別進入21世紀的資訊化社會，資訊量大，資訊載體品種多與經費有限、圖書館空間有限的矛盾，加強圖書選擇是一條出路。因此，加強圖書選擇理論與方法的研究，用以指導圖書採訪工作實踐，有其重要意義。
- (3)館藏結構的研究：從表面看，館藏結構是藏書建設的問題，實際是圖書採訪問題，是買書、進書之後形成的結構。就是今天已成形的藏書體系，通過圖書採訪工作還可以改變。從媒體材料看，過去的館藏結構大多單一，主要是紙質印刷型，今後大多圖書館會改變單一狀態，進入多維狀態，多種媒體兼有，以誰為主，比例多大，是值得研究的問題。
- (4)圖書經費的研究：購書經費，本是行政問題、管理問題，然而更是圖書採訪問題。沒有購書經費，圖書採訪無從談起。圖書經費，一般由國家或主管部門從預算中撥給，在預算中佔多大比例，如何保證到位

，如何每年有所增長；當前圖書經費普遍不足，如何在預算外開闢新的經費來源；已有經費如何用好，少花錢，買好書，多買書，產生最大效益，這都是需要研究的問題。

- (5)圖書採訪合作協調的研究：21世紀社會資訊量大，出版物多，圖書館購書經費有限，因此必須突破“一館獨立採訪”。分散、重複、無特色的作業模式，採用多館、系統、地區、全國，跨國採訪的合作協調方式，實現資源共享。這就要求圖書採訪學就合作協調的必要性、組織模式、方式方法，權利義務、制度等進行研究。
- (6)圖書採訪控制研究：主要研究國家、系統、地區的權力機構，或根據協議形成的組織，如何制訂統一的採訪方針和計劃。規定執行計劃的程序和做法，以及實施中的檢查監督等問題。
- (7)圖書採訪工作的評估研究：主要研究圖書採訪工作評估的要求、標準，質量評估、經濟效益評估、社會效益評估的內容與方法。
- (8)圖書採訪技術方法的研究：主要包括採訪資訊獲取技術、採訪作業技術、資訊技術、公共關係方法等。特別要重視計算機技術、資訊高速公路、網際網路等新技術的應用研究。
- (9)圖書採訪人員素質與職業道德的研究：採訪人員素質有思想素質、知識素質、能力素質、身體素質，職業道德包括職業道德的內容與職業行為規範等。

（本文為中國圖書館學會、國立政治大學圖書館於民國86年5月26日至28日假國家圖書館國際會議廳所舉辦之〈海峽兩岸圖書館事業研討會〉會議論文）



參考書目：

1. 王振鵠編著。《圖書選擇法》。台灣：學生書局，1984。
2. 顧敏著。《圖書館採訪學》。台灣：學生書局，1983。
3. 沈繼武編著。《藏書建設與讀者工作》。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1987。
4. (前蘇聯)斯多利亞洛夫，阿列菲也娃著；趙世良譯。《圖書館藏書》。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3。
5. 朱迪思·科林斯，魯斯·芬納著；朱強等譯。《國家採訪方針與採訪系統——現行系統與可能模式的對比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8。
6. 黃宗忠，論21世紀的圖書館。蘭州：《圖書與情報》，1996(2)。
7. 黃宗忠。《圖書館學導論》。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1988。

